DOI:10.3969/j.issn.1672-0539.2021.04.09

《文心雕龙》的文章分类学“系统论”

程修平

(南昌大学　国学研究院,南昌　330031)

摘　要:《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著作,其对南北朝及以前的重要文学作品和文章做了系统科学的分析和评价。从学术传承的角度上看,刘勰吸收了挚虞等前人“文体论”的学术成果,继承了向、歆、班固的“目录学”思想;从系统论的角度看,《文心雕龙》以文章分类学和文体论为理论基础,构建了以“圣言”为第一层次,以经书、纬书、骚体为第二层次,以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等二十余种文类文体为第三层次的“金字塔”式分类系统;从方法论上看,其通过“以本统末”、体用合一的“体用论”等研究方法揭示各类文类文体生成、发展、流变的内在机制。

关键词:刘勰;《文心雕龙》;文章分类学;系统论;文体论;体用论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39(2021)04-0059-10

南朝刘勰集先贤之智慧,聚千年文章之精华,创作出千年不朽的理论巨著《文心雕龙》,成就千年龙学之巨擘。刘勰之所以能高屋建瓴,纵横捭阖,品谈天下万千文章,是因为他一方面是站在刘向、刘歆、班固、挚虞等巨人的肩膀之上,有更好的视界、更高的视野;还因为他聪颖好学,甘于寂寞,熟读天下书籍,博古而通今;更因为他学术胸襟开阔,掌握了最为先进的研究方法和正确的研究方向。本文主要研究《文心雕龙》文章分类学的继承关系,以及系统论和方法论。首先,分析文章分类学与“文体论”的内涵与外延关系,研究刘勰对前人“文体论”学术成果的吸收和对向、歆、班固“目录学”成果的继承。其次,以文章分类学和“文体论”为理论基础,着重探讨《文心雕龙》文章分类系统,企图构建一个以“圣言”为第一层次,以经书、纬书、骚体为第二层次,以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等二十余种文类文体为第三层次的“金字塔”式分类系统。最后,将全书二十余种文类文体视为大系统之中的小系统,以各种文类文体之整体性范式为“体”,以文体之下创作者个性化创作的具体文体文章为“用”,通过“以本统末”、体用合一的“体用论”等研究方法揭示各种文体文章生成、发展、流变的内在机制。通过外在框架的构建、内在思想方法的挖掘,探讨古代文论的研究方法,研究古代文体的发展变化的轨迹和内在规律。

要讲清这些问题,首先要弄清楚文章分类学和文体论的内涵和外延。文章分类学是本文需要论述的基本范畴,它起源于先秦《尚书》,成熟于两汉的刘向、刘歆、班固,其涵盖的范围包括天下所有文体文章,即要用一定的文献分类原理和方法给天下所有文章进行合理的分类。文体论的内涵比较丰富。詹福瑞认为,古代的文体包含体类和体派,体类是指文章分类,体派即风格[1];徐复观认为,文体是基于文章的体裁、体要、体貌的综合学问,体裁之体为基底;童庆炳则认为,文体分为四个要素或四个层面,即体

收稿日期:2020-09-15

作者简介:程修平(1996—),女,湖北黄冈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学。

制、体要、体性和体貌,体制作为文体的基础,具有制约性[2]。陈剑晖总结认为,将体裁、体制层面的文体称为文类文体更为恰当[3]。在此有两点需要说明:其一,“文体论”中包含了文章分类法;其二,文章分类学比“文体论”的文章涵盖范围更广。“文体论”是汉魏六朝才发展成熟起来的,在文学的自觉性渐成趋势后,文学作为一门独立之学从包含了学术在内的广义的文章中独立出来,此时的文体论往往被狭义地理解为文学文体论。这种理解当然是不全面的。联系历史可以看到,自曹丕《典论·论文》的八体伊始,至陆机《文赋》的十体,再到挚虞《文章流别论》的十一体,无不既包含“文”,又包含“笔”,绝非纯文学的文体论。另外,即使承认六朝文体论涵盖了天下之“文”和“笔”,亦不完全等同于基于目录学思想的文章分类学。戚良德在《文章千古事——儒学视野中的〈文心雕龙〉》中说,刘勰的“文”乃是我们今天所谓“文学”和“文章”的总和[4]。即使如此,文章分类学和文体论之间,有很大的共通之处的。如班固的文章分类包括六艺(经书)、诗赋、诸子等,没有史传;刘勰的文类文体包括诗、赋、诸子、史传等,史传独立出来,但“经书”不在其列。如果我们将文章分类学的分类标准与文体论的“文类”分类标准进行一体化的统筹的话,那么它们之间的实践操作(分类)和理论建设(方法)就可以共通同用了。故本文在进行学术论述(构建一体化文章系统)时一方面努力寻找基于目录学的文章分类和基于“文体论”的文类文体分类之间的渊源关系,构建两种分类的直通点,同时,既采用基于目录学的文献学思想,又大量吸收文体论的理论成果。

一、源流

古往今来但凡大学者都十分重视文章分类及目录学研究,认为做好文章分类是做好一切学问研究的入学之门。唐朝毋煚在《古今书录序》中叹道:“苟不剖判条源,甄明科部……使学者孤舟泳海弱羽凭天衔石,溟倚杖追日,莫闻名目,岂详家代,不亦劳乎?”清代学者张之洞在告诫初学者而撰写的《书目答问略例》中说,“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今为分别条流,慎择约举,又于其中详分子目,以便类求……总期令初学者易买易读弁陋者当思扩其见闻,泛滥者当知学有流别。”[5]清代学者章学诚针对浩繁驳杂的古典文献,在他的《校雠通义》中提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6]的研究方法。所谓“辨章”,可以理解为“辨考”,即考辨学术思想的异同,进而对天下学术文章进行归纳分类。最早给书籍分类始于汉代。西汉刘向在政府的支持下对天下图书进行了大规模的搜集、整理、校阅和归类,成果编为《别录》;而最早对书籍进行系统而完善分类的是刘向的儿子刘歆,他撰写了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图书分类书《七略》。在目录学中向、歆二人富有奠基作用的两书均已亡轶,其大部分思想集中保留在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汉志》记载:“歆于是总群书而奏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7]1701《汉志》将传统的典籍分为六大类,分别是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六分法奠定了书籍分类的基础,为千万文章找到梳理的门径,却又不是文章分类学的最后定论。《文心雕龙》继承了《别录》《七略》《汉书·艺文志》的目录学思想,囊括了时下留存的各种文体文章,将不同的文体文章有序归类的同时,展现了其天才的文章分类学创意。

《文心雕龙》虽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但其纵览天下文章,高瞻远瞩,学术独创,寓文章分类学于文体论中。刘勰的文章分类学思想既来源于曹丕、陆机、钟嵘、挚虞等,也来自刘向、刘歆以及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表面上看,《文心雕龙》文章分类学针对的重点是文体论,即站在文学创作的角度对天下文章进行分类;而《汉书·艺文志》所代表的目录学分类则是针对天下既有的图书,是站在书籍的社会功用等角度对天下图书进行分类。两者看似角度不同,研究方法各异,其实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血脉联系。

首先,刘勰吸收了前人“文体论”的成果。中国自古就有比较成熟的文体分类学,先秦早期代表性的作品便是《尚书》,《尚书》将其收录的作品分类为典、谟、训、誓、诰、命等,文体分类学的特点十分明晰。汉魏六朝以来,有关“文体论”的文章颇多,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钟嵘的《诗品》等已经相当成熟,《文心雕龙》固然是“文体论”学术成就的最高峰,但是之前亦有影响颇大的脍炙人口作品,比如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挚虞在编撰《文章流别集》时根据目录学分部类方法,将天下文章按照不同体例分类,并仿照先贤对每种文体进行“溯其起源”,“论其正变”,评品诸家撰作之得失,“各为之论”,得到类似于《别录》和《汉书·艺文志》的新作

《文章流别论》。李婧在《〈文心雕龙〉文体论与目录学》中说:"所谓《文章流别论》,原本并不是一部独立的文体论著作,而是《文章流别集》的附论。是挚虞在将众多文章划分文体后,为各体所作明含义、考源流、评得失的类序,其产生正是延续目录类序的思路,体例如出一辙,具有明显的目录类序性质。"[8]《文心雕龙》直接继承《文章流别论》的部类,将其颂、赋、诗、七、箴、铭、诔、哀辞、哀策、对问、碑铭等十一种文体,扩展为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等二十大类三十三种,其文章分类法和目录类别思想,完整有序,思路清晰,对《文章流别论》和《汉书·艺文志》等前人成果有继承亦有创新。

其次,刘勰继承了向、歆、班固的"目录学"成果。《文心雕龙》的"文体论"的创作直接受到《别录》《七略》《汉书·艺文志》等目录学著作的深刻影响。《梁书·刘勰传》记载:"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汪春泓在《〈文心雕龙〉与〈汉书·艺文志〉渊源关系研究》中分析说,"所谓'区别部类,录而序之',实与向、歆《别录》《七略》之编撰十分相似,可谓异曲同工者也。"[9]《文心雕龙》的文体类例、学术阐述,充分借鉴了目录学的源流之作《汉书·艺文志》等的既有成果,对其学术成果和学术观点进行了大量复述和征引。《别录》《汉书·艺文志》等有提要、大小序,记录或阐述相关书籍的流变发展,这些宝贵的文献资源成为刘勰进行"文体论"创作的现成内容,被直接摘录或复述。如在论及"诗"的文体起源时:

> 《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书·艺文志》)[7]1708

> 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自王泽殄竭,风人辍采,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秦皇灭典,亦造仙诗。"(《文心雕龙·明诗》)[10]65-66

比较两段文字可知,《文心雕龙》对《汉书·艺文志》的继承不仅表现在内容的直接征引上,比如"诗言志,歌永言";还表现在内容的复述和转述上,比如"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是对"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的转述,"应物斯感,感物吟志"是对"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的异曲同工的表达;更表现在对《汉志》思想的传承上,比如对诗歌的"诗言志"、"讽诵"观、"有感而发"论等,刘勰进行了直接的继承和旌表。统计表明,《文心雕龙》征引《汉书·艺文志》的频次达 57 次,主要集中在"文体论"部分,其中"诸子"篇征引达到 20 次之多。

在论及"史传"的写法时:

>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籍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汉书·艺文志》)[7]1715

> 轩辕之世,史有仓颉,主文之职,其来久矣。曲礼曰:"史载笔。"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古者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也……自平王微弱,政不及雅,宪章散紊,彝伦攸斁。昔者夫子闵王道之缺,伤斯文之坠,静居以叹凤,临衢而泣麟,于是就太师以正雅、颂,因鲁史以修春秋。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然睿旨幽隐,经文婉约,丘明同时,实得微言。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文心雕龙·史传》)[10]283-284

对比《汉书·艺文志》和《文心雕龙》在"史传"上的写法,无论是从内容到思路,还是从语气到主题,都可见《文心雕龙》对《汉志》在体例和论述上的亦步亦趋和如出一辙。

二、系统

《文心雕龙》共五十篇,分为五个部分,分别是"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和"序志"。放下

“创作论”“批评论”不说,我们从“序志”“总论”中分析作者是如何高屋建瓴,纵横捭阖,品谈天下万千文章。《文心雕龙·序志》云:“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道”“圣”“经”“纬”“骚”是全文的枢纽,提要全文,更是全文所有章节相互联系的中心环节,全篇的写作皆是以此为宗旨展开。《文心雕龙·原道》阐释“道”为“天地之心”“自然之道”,同时点出“文”与“道”的关系:“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文是万物的雕饰,“道”才是文章的核心,就学者而言需要把握其中的“道”来进行撰文。如何坚持儒家之“道”,作者认为“征圣”与“宗经”是重要途径。《征圣》有言:“先王圣化,布在方册,夫子风采,溢于格言。”要求学者思想上需要遵从“征圣”原则,以圣人之言为行动纲领。而在具体的文章写作中,《宗经》写道:“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儒家“五经”才是文章根基,“宗经”不仅是《文心雕龙》始终践行的写作要义,也是学者进行任何创作实践必须践行的重要宗旨。又说“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强调经典和各种文体文章之间的体用关系,枝叶关系。总之,“道”是核心,“征圣”是基本原则,“圣言”“圣文”“圣训”必须高高在上;“宗经”是创作的根本手段,儒家经典是学者的模板;“文体论”中二十大类三十三种文体则包罗万象,“文”与“笔”兼有,是文章的主体,学问的枝蔓,但其目的都是为了揭示天地之大道或某一个生产、生活方面的小道。针对汉代以来“文体解散”的情况,刘勰力图重建文体新秩序,张健在《〈文心雕龙〉的组合式文体理论》中分析道:“刘勰之文体论本于以文体为物体之观念。物体由各元素、部分组合而成,文体亦如此;物体为一组织有序之整体,文体亦如此;物体组合有法,文体亦如此。”[11] 如果试图描摹《文心雕龙》的文章分类学思想,则可以构建一个“金字塔”式模型系统:

第一层:“圣言”。“圣言”处于“金字塔”的塔尖,是天下文章的核心。“圣言”不仅体现在“方册”,还表现在“格言”上,固称之为“圣言”而不是“圣文”。在古代儒家学说理论中,孔子等圣人言行都包含了丰富的“道”,甚至可以说“道”是靠“圣言”才得以存在和表现出来。《文心雕龙》之所以说“体大虑周”,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刘勰以“道”统御全篇,不以“雕龙之技”为重,而是以“文心”为要。

“道”乃“自然之道”,即普遍的宇宙法则,能贯通天地人的天地之至理。《原道》篇说:“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在刘勰看来,“道”和“圣”是有机的结合体,并以“圣典”“圣训”等形式表现出来;换个角度说,以“圣典”“圣训”为表现形式的“圣言”必然是载道的;同时,通晓“天地之心”的圣人是思想和文章的主体,儒家的人文之道和蕴含天地至理的自然之道是通过圣人才得以晓示和阐发,“圣言”是“道”和“圣”的美丽结晶。又,“圣言”是最符合“文”的要求的,即所谓“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因此,刘勰要求“论文必征于圣”。以儒家之“道”为内核、以儒家经典的“五经”为基础、以周公、孔子为代表的圣人之言,是“道”“圣”“言”融为一体的外在表现,是高悬在中国文人雅士头顶光芒万丈的永久思想宝库,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家园。

第二层:经书、纬书、骚体。如果说第一层的“圣言”是高高在上的阳光,是精神层面构筑的佛光宝象;那么这第二层的“经”“纬”“骚”则是润泽万物的雨露,是实践层面树立的标杆。阳光普照的时候,人们能够享受的除了温暖,更多的则是精神世界的慰藉;雨露降临的时候,万物得以滋润,形体得以洗濯,人们可以及时享用,还可以储备待用,周济他人,储备得越多,有利万物的范围则会越广。在第二层的经、纬、骚中,经为根本,纬为附庸,骚为经书之延伸。邓国光在《〈文心雕龙〉文体通义》中说:“孔子与屈原都是属于总汇、转化与创造的典范。孔子的文章是‘通’的化身,体现理想的立文造诣与高度;而屈原则是‘变’的象征,体现巨大的心灵力量与优越的驾驭文字书写的绝技。”[12]

刘勰认为,“窥圣必宗于经”,对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经书推崇备至。《宗经》说,经书是“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经书和“圣言”一样,能够穷极“天地之心”和自然之理,其根本地位不可动摇。但经书和“圣言”又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圣言”更多的是精神的动力源,经书则是学者的模仿和效法的对象;“圣言”是思想的擎天柱,经书是普世法则。《文心雕龙》多处论及文体起源于五经,认为经书是“群言之祖”,各种文体“实经典枝条”,都源于经书,故“百家腾跃,终入环内”。经书的特点是

"道心惟微,圣谟卓绝,墙宇重峻,而吐纳自深","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只要诚心向经书学习,便能"太山遍雨,河润千里"。

至于纬书,则是一种假托经义以宣扬谶纬之学的迷信著作。刘勰罗列此目,一是要证伪;二是承认其是现有书籍的一种,不可不列;同时认为谶纬之书对文学创作有帮助。《正纬篇》说:"羲农轩嚳之源,山渎锺律之要,白鱼赤乌之符,黄金紫玉之瑞,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纬书是伪造的,是作为经书的附庸而存在,如同皇殿上皇帝身边的值班太监,虽被人无视,却也能站班在帝王之侧,众大臣之上。

骚体,指骚体诗,是以屈原、宋玉为代表的先秦楚地诗人用楚国方言创作的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文学的地位日益高涨的魏晋六朝,文学创作日益丰富,文学理论著作如雨后春笋,其中诗赋最盛,统领文坛数百年长盛不衰,作为诗赋源头之一的骚体诗,地位只有越来越高的。因此,骚体诗被刘勰拔擢到与经书几乎并列的地位,也就不足为怪了。在《辨骚》中,刘勰认为骚体诗"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和《诗经》一样,仍然是学者仰望之所在。刘勰把以《离骚》为代表的骚体诗和《诗经》相提并论,"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欸唾可以穷文致"。刘勰"辨骚",其实是为汉魏以来少数对骚体诗的有失公允的评价进行辩解。王运熙在《〈文心雕龙〉的宗旨、结构和基本思想》中分析说,"刘勰认为作文应以雅颂等经典为根本,同时尽量采取《楚辞》的优长,做到奇正相参,华实并茂,这是他总结了《五经》、纬书、《楚辞》等书的文学特色以后对创作提出的一个总原则或总要求。"[13]又,骚体诗在文学大昌的魏晋南北朝影响力不在经书之下,实为经书之延伸,把骚体诗列入第二层是应有之义。

从文章分类学上说,经、纬、骚更多的是文学的样板,天下文章的源头活水,万世楷模,不可多得,不可更易。

第三层: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讔、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定下根基、固定枢纽后,刘勰根据文体写作需要将文献典籍按照文体的"体用论"分门别类,共总结了二十大类三十三种文体。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体裁和风格这些文体学研究范畴滥觞的基础上,"整体"和"辨体"便被学者渐渐重视。《文心雕龙》的文章分类学,突破了曹丕《典论·论文》的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等八种文体,陆机《文赋》的诗、赋、碑、诔、铭、箴、颂、论等十种文体,挚虞《文章流别论》的颂、赋、诗、七、箴、铭、诔、哀辞、哀策、对问、碑铭等十一种文体,文章分类更为精准、完备,突出体用关系,更贴近实际。各种文体之下又细分小类。比如纪传体分为尚书、春秋、纪、传、书、表、志等,杂文体分为对问式、七发式、连珠式,以及典、诰、誓、问,览、略、篇、章,曲、操、弄、引,吟、讽、谣、咏等。全文罗列分析的文体亚类四十多种,仅收录名目不作分析的文体又有四十余种,总计文体达到一百一十种以上,收录了当时流行和史料记载的几乎所有文体。这一层次的文体及所涉及的文章,"文""笔"兼备,囊括一切。

在"辨体"时,强调文章整体属性的同时,详细地论述了每个文类文体里的一种或多种文体,研究文体的起源、流变、特点及创作经验,总结运行规律。详细列举各种文体及其亚体的代表作品,叙述源流,品评得失,几尽天下学术文章的主流。体例之广泛,内容之丰富,前所未有。包括很多小众文体如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应用文体如谱、籍、簿、录、占、式、律、令、法、符、契、券等,将各种小众文体呈列在大众的视野之中,大大提升了小众文体的地位。

刘勰"辨体"的行文思路也遵循一定的法式。正如《文心雕龙·序志》所说:"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下面以《文心雕龙·明诗》篇为例,作以阐述。首先,考证诗歌最早的起源,通过大舜的"诗言志,歌永言",得出"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诗感说"理论,此乃"原始以表末"。其次,分析诗义:"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认为诗歌是扶持、端正人的性情的;此为"释名以章义"。接下来叙述诗歌的发展历程,从葛天玄鸟,到黄帝云门;从尧有大唐,舜造南风,到大禹九序惟歌;从商周雅颂,到辍采国风;从汉初四言,古诗五言,到建安五言风骨;从晋世玄风诗,到宋初山水诗,详细论及诗歌在各个朝代的发展和流变。接着,选文定篇,举出有代表性的诗歌作品,论及先秦的风雅颂、离骚,汉初韦孟、古诗十九首,以及汉末的建安七子作品,魏晋的何晏嵇阮、张潘左陆,六朝的袁宏孙绰郭璞等,纵横捭阖,品评得失。然后,具体分析诗

歌创作的纲领,要求四言"雅润为本",五言"清丽居宗",但在具体创作中也要"随性适分,鲜能通圆",这是"敷理以举统"。最后以简单的四句诗文统领全文。二十文类文体,分别建立起其立文的标准,篇篇如此,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文体范式。刘勰既重视基本文体范式的建构,并以此为"本",但同时强调诗歌创作的个性化,认为"诗有恒裁,思无定位",创作者要"随性适分"。我们把这种重源头、梳流变、品作品的写作模式概括为"溯源归流"式的叙述方式,它更类似于后世提要式目录著作。

至于《文心雕龙》中的创作论、鉴赏论、作家批评论等内容,虽然精彩,实际上只是"文体论"之大系统的附庸,因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之内,故不做重点论述。

这种三层的"金字塔"式学术分类学的模型系统,儒家之"道"是天地运行的至理,是系统的总发动机,"圣"是通天彻地的人杰,"圣言"是"道""圣"合一的精华,即沟通天人、天人合一之文化显现,"经书"是"圣言"的基本法则的直接体现,二十大类一百小类的文类文体则是在"圣言"和"经书"精神统摄下合规运行,"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并企图达到揭示天地运行规律,描述社会发展真理,晓畅人间生存发展道理,即文章的最终目的是无限接近于真理。此模型系统的构建是由《文心雕龙》学术精深、眉目清晰、"体大虑周"的内部结构决定的,是刘勰胸襟开阔,通过掌握最为先进的研究方法,精研理论、醉心学术而创造的系统研究成果。

三、特征

系统思想源远流长,中国最早的人文学著作《周易》就是一部富含系统论思想的伟大著作,它不仅是儒家的经典,同时也是道家、阴阳家等诸子学派共同的思想源头,深刻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达数千年。最早提出"系统论(SystemApproach)"理论的人是美籍奥地利人贝塔朗菲,他认为系统是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文心雕龙》的金字塔式文章分类系统体系周密,层级清晰,结构严谨,从系统论的角度说,具有以下特征:整体性、生成性、大系统和小系统的协调性、变与不变的统一性。

(一)整体性

系统论的核心思想是系统的整体性。《文心雕龙》的文章分类学的最大亮点是,全文以文章分类学和文体论为理论基础,构建一个以"圣言"为第一层次,以经书、纬书、骚体为第二层次,以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等二十余种文类文体为第三层次的"金字塔"式分类系统。儒家之"道"是发动机,其巨大的能量维护者整个系统的运行;同时,"道"又是总纲,具有一贯到底的巨大穿透力,它的力量和影响力贯穿经书,直达各种文类文体,渗透进每一篇具体文章中。顺着看,这个系统模型是"金字塔"形,"圣言"是沟通天人、笼罩一切的至高无上,"五经""六艺"等则是中间的擎天之柱,而最下一层的二十类上百种文类文体则是奠基之石,整个系统上接天、下着地,结构稳定,支撑有力,上下三层,浑然一体。倒过来看,这个系统模型则是"参天大树"形,"圣言"是深入大地、根系庞大、根深蒂固的根本,"经书"则是结构刚强、伸展有力的枝干,二十大类一百小类的文体文章,就如营养充足、茂密葱茏、茁壮成长的枝叶,整个系统根、干、叶相连,根深叶茂,生机勃勃,并不断延伸发展。

(二)生成性

延续上文的两个比喻来说。在"金字塔"系统中,最下一层的二十大类上百种文类文体是奠基之石,在这些大小不一的奠基石中,较大的石头在上层的重力作用下会裂变成更多的小石头,而一些小石头在特殊的环境和强大的重力作用下也会聚合成大石头,这便是系统作用下的生成。在"参天大树"系统中,每时每刻都有枯枝折断、败叶飘零;更多的则是"芳林新叶催陈叶",新枝新叶蓬勃生长,生生不息。这便是系统的生命力。《文心雕龙》的"文类文体"生成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文类文体的内容与形式决定的,如:刘勰在《时序》中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说明文体的产生是随着表现内容的特殊需要而发生,又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各种文体之间的相互影响而发展和演变着。于维璋在《刘勰论文体》中分析说:"刘勰总是极其明显地指出文体的产生和演变是决定于客观现实……即文体总是为反映特定的现实内容、发挥文学的教化作用服务的。"[14]这是一种外在的生成因素。另一方面是由文体的体用关系决定的。《文心雕龙》的系统既体现了模型整体的生机勃发,还在于深刻揭示文类文体生成的内在机制。姚爱斌在《论中国古代文体论研究范式的转换》分析说:"在文体创作中,作者一般先有一个关于所有文章的整体范型——尽管很多作

者在写作时未必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接着是对文类文体的确定,在这一环节,作者需要在意中形成一个比较清晰的关于某种文类文体的整体范型,包括适合这种文类文体的题材内容和语言形式等;最后才是一个直观的具体的文章整体的完成。当这一创作过程完成后,文章共同之体和各种文类之体便自然融入直观具体的个别文体之中。"[15]《文心雕龙》每一个"文体"内部,应用"体用论"研究方法以"文体"的共性为本体,在通过研究获得"文体"的整体范式后,建立某类"文体"的整体范型,最后才是创作者以"文体"的整体范型为依托,创作出某一个具体的个性化文章,即"用"。在这一创造过程中,文章的整体范型自然融入创作者创作的具体个性化文章之中,达到"体""用"合一。这种文体的生成、流变,使整个系统具有勃勃的生命力。

(三)大系统和小系统

大系统,以"道"为动力源,由"圣言"为统率和核心,旗帜鲜明,一以贯之,维系着三层分类结构,是考察和研究汉魏六朝文章分类学、文体论的重要系统。大系统下又分若干个分系统。比如:"经书"中的《周易》与论、说、辞、序四种文类文体构成一个"易"类分系统;《尚书》和诏、策、章、奏四种文类文体构成一个"书"类分系统;《诗经》与赋、颂、歌、赞四种文类文体构成一个"诗"类分系统;《三礼》和铭、诔、箴、祝四种文类文体构成一个"礼"类分系统;《春秋》和记、传、盟、檄四种文类文体构成一个"春秋"类分系统。分系统和总系统构成分总关系,体系非常严密,结构异常紧密。分系统之下,系统模型的第三层是二十个文类文体,每一个文类文体都是一个形制独立、体系相对健全的小系统。用体用关系的方法来分析,各种文类文体的共同之"体"和具体的个性化文体之间,构成一种体用关系,通过体用关系的运动,形成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小系统。二十个小系统的共同运作,推动着各种文类文体不断发展、流变,直至消亡。整个系统中,大系统涵盖分系统、小系统,大系统推动分系统和小系统运动,并为其提供思想和动力;分系统和小系统在大系统的影响下合规运作,不断发展、流变,甚至产生新的子系统,成为整个大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四)变与不变

就大系统、分系统和小系统而言,大系统是不变的,分系统和小系统则随时而变,闻风而动;就分系统和小系统而言,分系统是不变的,而小系统则生生不息,发展、流变不断。这里讲两重意思:第一,变与不变,都是相对的。就"圣言"和"五经"而言,它们是"恒久至道""不刊鸿教",是"群言之首"、文章楷模,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变化、风气的积习,对"圣言"和"五经"的解读和"使用"也会各有不同。就"文体论"而言,文章的共同之体是不变的,而各种文类文体的具体表现形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变化,每个朝代都会产生和流行某个主流性的文类文体,比如汉崇尚赋,唐盛行诗,宋流行词,元热衷曲等。就每个文类文体而言,各种文类文体是相对不变的,而每一个具体的个性化文体文章则是随着创作者的知识、阅历、思维、水平、情绪的不同而千差万别,以至于"远近高低无一同"。就体用论而言,"体"不变,而"用"变。第二,不变是相对的,变是绝对的。《通变》有"通变无方",就能"驰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定势》说"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只有变,文章才有生命力;只有变,文类文体才能发展;只有变,系统才有创造力。

四、理论

《文心雕龙》分类系统有没有强大的生命力,能不能达到研究古代文章分类规则及文体发展变化规律的目的,关键是看整个体系是否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下面研究本系统的相关理论。

(一)刘勰的文章分类学是建立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之上

《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核心是独尊儒术、原道征圣,"尊经崇古""笃信儒学"是其理论体系的基本原则。戚良德在研究了六朝社会思潮后说:"刘勰的初衷是要对孔门四教之一端——"文教"进行研究,所以《文心雕龙》不仅是一部文学理论,更是一部儒家人文修养和文章写作的教科书。"[4]

儒家思想孕育于周朝的礼乐文化,发端于孔子的校诗书、订礼乐、编春秋。自孝武之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开始步入政坛,并迅速发展成为历朝历代治国理政唯一依赖的正统思想。其时,两汉政府广开学校,以"五经博士"教授弟子,培养儒学人才,儒家经典成为政府用人取士、选官拔擢的不二教材和唯一标准。在这样的社会思潮之下,即使是到了魏晋玄学大昌的时代,儒家思想仍然是大多数学者士人心中不可替代的根本思想。在儒、佛、玄盛行的南朝宋梁之际,刘勰笃信儒学,奉经书为文学之

"圭臬",创作出不朽的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其"纬军国""任栋梁""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的积极进取思想,正是儒家自强不息、积极用世思想的最好体现。

《序志》云:"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哉,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刘勰青年时期连做梦都想"随仲尼而南行",可见其对儒家思想的极度推崇和根深蒂固的狂热;他的人生理想原本是想通过"敷圣注经"以达到广大儒学、流芳千古之目的,却因为马融、郑玄的成就在前,不能"立家""成说"于郑马之上,故退而求其次,选择著书立说。著书立说也还是为了昌明儒家思想,以正"周书论辞""尼父陈训"的文学影响。

经过全文梳理,儒家思想在《文心雕龙》中的深刻影响表现在:第一,以儒家思想的"道"为内核,以"五经"为基础,构筑"道""圣""言"三位一体的全文思想核心;第二,"尊孔",笃信"玄圣创典,素王述评",通过"圣"达到沟通天人,实现天人合一;第三,崇经,把儒家经典看作是不可更改的真理,作文的不二法则,视为"至道""鸿教""群言之祖",极尽颂扬之词;第四,积极用世,"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要求文人"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当然,在大谈儒家思想对全文覆盖式影响的同时,刘勰故意淡化了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具体思想对文章具体写作内容的占有,强化儒家思想对文人学者思想的占有,弱化其对思路、方法、内容等方面的影响力,在具体的学术分类和论文写作方面遵从具体的写作规律。

(二)刘勰的文章分类学体现了汉魏六朝最先进的文学理论思想

《文心雕龙》继承儒家的文学理论思想,在弘扬儒家文学理论奠基作《诗大序》的基础上,大量吸收玄学、佛学理论,对儒家文学理论有所创新和发展。

1."文质观"

文质实际上是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是古代文学理论的传统命题。文质理论源自孔子提出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表示文与质互相制约;到南北朝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则将文质观推向成熟。《文心雕龙》提出"质"即"文心",也就是儒家之"道"。"道"为作品之核心,是文学系统的源头,是作品的灵魂;"文"则是作品的表现形式,是"雕龙之技",虽然重要,但却必须服从于内容。《文心雕龙·情采》写道:"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总结而言,刘勰的文质观是建立在儒家之"道"的基础上,用儒家之"道"来阐释文章创作的根本原则,并以"道"为"本体"来论述"文"与"质"的本质统一、内容和形式的高度一致。刘勰虽没有提出"文以载道"等类口号,但其提出的"文附质""质待文"的思维范式体现了其对文质观的深刻把握。这也是《文心雕龙》构建金字塔式分类系统的重要理论基石之一。

2."文体论""创作论"和"鉴赏论"

《文心雕龙》借鉴陆机《文赋》的创作论思想,开创了最为系统、影响深远的文学创作论;学习钟嵘《诗品》的诗学理论,在物感说、言意说、风格说、肌理说、形神论、虚实说等鉴赏理论上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境。《文心雕龙》固然是古代"文体论"学术成就的最高峰,在创作论和鉴赏论的理论体系建设上亦是到达了那个时代无人能及的高度,是对汉末以来文艺工作者创作和鉴赏的系统总结,是集大成之作,对后来的文艺理论有着深远影响。然其对文章分类系统的影响不大,只是作为"文体论"的附庸而存在,故本文不予详论。

下面重点说"文体论"。《文心雕龙》聚集前人的文学理论研究成果,继承曹丕《典论·论文》、挚虞《文章流别论》的文体分类学思想,开创了新的文体论。刘勰的"文体论"的核心范畴有两个方面:其一为"体裁论"和"风格论"的二元论,这是古代"文体论"的标准范畴和主流方向,研究者趋之若鹜,研究成就大昌,光辉夺目;其二是"体用论",这是一种隐性的方法论,隐藏在《文心雕龙》的文章系统论中,为其庞大的文章分类系统提供了稳定的一体化的理论支持,并使其充满生机勃勃的发展力。《文心雕龙》的"文体论",视天下所有文章"本为一体",在借鉴两汉"目录学"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包括"圣言""经书"等在内、囊括一切文类文体的文章分类系统。即把文体生成分为所有文章的共同之体、各种文类文体之体、具体的个别文体三个层次,形成了两层体用关系。在文体的发展和创作过程中,体用规律是文体生成的内在机制。"文体论"也是《文心雕龙》文章

分类系统的基础理论之一。

3."体用论"和"本末论"

体用论和本末论是中国古代文体论的一种重要方法论。魏晋六朝时期,文学理论家充分吸收了玄学的哲学思想,丰富和发展了文学体用论和本末论。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其中"本""末"即"体""用"。深受六朝文艺思潮浸润的刘勰,其文艺理论思想自然受到了玄学较深的影响。姜葆夫在《〈文心雕龙〉与儒学及玄学的关系》说:"刘勰还据玄学方法论构筑了《文心雕龙》的论文体系。王弼方法论思想的主要特征不完全在于辨名析理,主要是用体用、本末方法来处理有与无、现象和本质的关系,在抽象和具体之间架设了一道桥梁,以本统末、以一御万是其方法的主要内容。"[16] 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说"正本归末",在《总术》说"乘一总万",皆是对王弼思想方法论的吸收和借鉴。在《文心雕龙》中,"体用论"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以儒家之"道"作为思想灵魂,以"道""圣""文"融合的"圣言"为不变的"本体",以儒家经典的"五经"等为作文立言的基本法则,这即是"用";第二层次,以儒家经典的"五经"等为"本体",以二十余种基本文类文体的产生、发展、变化为"用";第三层次,以文类文体的共同之体(共性)为"本体",以个别个性化文体及其流变为"用"。三层体用关系,举本统末,体而为用,结构严谨,系统周密,为文章分类系统的重要方法论及发展性理论之一。

(三)刘勰的文章分类学的现实意义和对儒学思想的创新

魏晋之后的南北朝时期,刘勰所极力推崇的儒家思想受到了来自内部的玄学和来自外部的佛学的强大冲击。玄学延续魏晋那股肆虐之势,继续占领着士人阶层的思想空间,虽然荣光不再,其影响却不容小觑。那时战乱频繁,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加上土地兼并严重,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来自印度的佛教和来自本土的道教乘虚而入,迅速占领了老百姓的精神世界。杜牧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诗句,足见佛学之盛况。道教也曾因为拥有黄巾军、天师道军、五斗米军等武装力量而影响力极为广大。其时,儒、佛、道三教鼎力。南朝宋以后,统治阶级兴学重士,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玄学开始盛极而衰,儒学思想再次受到重视。到南朝梁时代,佛教曾被梁武帝定为国教,但是经学成就依然卓然,儒学大昌之势已成。刘勰正是生活在这种去玄、尊儒、崇佛为主流思想的时代,恢复儒学荣光是他此时主动担在肩上的责任。他在《程器》中慷慨激昂地表白:"君子藏器,待时而动……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刘勰蓄积一身学问,以文明志,愿意为儒学大昌冲锋陷阵。

刘勰一方面反对在文章中宣讲玄论、图解老庄,另一方面大方地给予玄学"独步当时,留声后代"的独创性作品以褒扬和肯定,并充分吸收一切玄学理论成果,为我所用。《文心雕龙》文章分类学的核心思想是体用论,这便是博学多思的刘勰充分吸收王弼的玄学思想,借用其"以本统末""以一御万"的方法论,建立起一个以"道"为"本",以经书及形形色色的文体文章为"用",统一而完整的理论体系,推动了六朝文学理论的创新发展,增加儒学文学理论的思辨色彩。

《文心雕龙》的理论创新还表现在对文类文体基本范式的建立和对文类文体生成机制的研究上。刘勰在个别文体文章的论述中往往能从丰富的文学史实出发,辨体正名,支分派别,创设"表末""释名""定篇""举统"的文体论基本法式,如同一个个的生动活泼的文体演变简史。在《文心雕龙》文章分类学中,他通过"金字塔"式系统的构建,研究各种文类文体的流变;通过文类文体内在的"体用关系"的揭示,即通过所有文章共同的基本范式与各种文类之体的基本范式、各种文类之体的基本范式与具体的个性化个别文体的体用规律的研究,揭示了从文章共同范型到各种文类文体再到具体的个性化文章的文体发展与创造的内在机制。

参考文献:

[1]詹福瑞.古代文论中的体类与体派[J].文艺研究,2004,(5):63-67.

[2]童庆炳.《文心雕龙》"文体"四层面说[J].天津社会科学,2015,(5):123-131.

[3]陈剑晖.文体的内涵、层次与现代转型[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0):108-114.

[4]戚良德.文章千古事:儒学视野中的《文心雕龙》[J].文史哲,2014,(2):125-132.

[5]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3.

[6]王重民.校雠通义通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2.

[7]班固.汉书[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1701,1708,1715.
[8]李婧.《文心雕龙》文体论与目录学[M]//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二十九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9]汪春泓.《文心雕龙》与《汉书·艺文志》渊源关系研究[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6):1-11.
[10]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65,283.
[11]张健.《文心雕龙》的组合式文体理论[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31-41.
[12]邓国光.《文心雕龙》文体通义[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5-12.
[13]王运熙.《文心雕龙》的宗旨、结构和基本思想[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5):75-84.
[14]于维璋.刘勰论文体[J].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2,(3):50-57.
[15]姚爱斌.论中国古代文体论研究范式的转换[J].文学评论,2006,(6):42-48.
[16]姜葆夫.《文心雕龙》与儒学及玄学的关系[J].文史哲,1983,(4):78-83.

The Systematic Theory of Article Taxonomy of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CHENG Xiuping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su 330031, China)

Abstract: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is a literary theory work with great thinking. It analysed important literatures befor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scientifically and systematicall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academic inheritance, Liu Xie absorbed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s of "stylistics" of Zhiyu and others, and he inherited the idea of "Bibliography" from Xiang Xin Bang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theory", it 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article taxonomy and stylistics to construct a pyramidal classification system. The first layer of the pyramid is "Sheng Yan", and the second layer is "Jing Shu" "Wei Shu" and "Sao Ti" and the third layer is more than 20 styles like "Ming Shi". Methodologically, it reveal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stylistic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end of this system" "the unity of the body and the use" of the method.

Key words: Liu Xie;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article taxonomy; system theory; methodology; stylistics; the theory of body and function

编辑:黄航